

論“一國兩制”的歷史必然性

楊允中*

一、前言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一個從未有過的嶄新政治詞匯——“一國兩制”開始出現在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媒體。在這之前，不僅中外詞書、文獻從來未涉及過這一主題，即使西方學者也同樣無人敢於把自己思維方向向這個目標傾斜。1978 年底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主持並引導下，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提倡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膽果斷地推出改革開放的新路線，隨後又把“一個中心（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堅持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原則）”以及“發展是硬道理”作為指導國家發展的基本方針。20 多年過去了，這期間中國發展之快、變化之大，不僅在中國歷史上，而且在國際上也都是空前的。如今，中國整體上達到小康水準，已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之一，成為國際市場一個重要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中國的發展成效不僅直接關係到十三億本國人民命運的改變和福祉的增強，而且也進而構成世界文明演進的巨大推動力。經濟上、物質領域內，中國走出了成功發展之路，政治上、文化領域內，中國的發展經驗正式形成了科學而完整的鄧小平理論，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作為世紀偉人，鄧小平的名字已經載入史冊，鄧小平的功績受到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普遍尊重。作為鄧小平理論重要組成部份的“一國兩制”思想不僅成為祖國和平統一的指導原則，而且在港澳兩地回歸以及港澳兩

* 澳門大學校長高級顧問、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個特別行政區的發展過程中展現出無比的生命力。作為目睹見證上述巨變的一份子，作為“一國兩制”實驗區和示範區的正式居民，我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感受尤其直觀、具體。此時此刻，感性的認識與理解固然重要，理性的認識與理解則更為必不可缺，因為，只有經過不斷提升的完整而正確的理解，才可以有效地推進“一國兩制”的實踐符合其初衷本意、不被誤解誤導。所以，對其進行深入而系統的研究交流，就自然成為特區堅持依法施政的一個重要條件，成為特區居民進行法治建設的一個切入點，成為特區政治社會生活中須臾不可離開的一件大事。

“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旗幟，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加強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團結，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和僑務工作，堅持‘一國兩制’方針，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這是中共十六大工作報告總結近5年以至近20多年改革開放十條基本經驗的其中一項。講社會主義不能脫離愛國主義，強調愛國主義不能背離社會主義，在某種意義上理解，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加愛國主義。在兩面旗幟下擴大團結面、增強凝聚力，通過愛國統一戰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和民族偉大復興，是現代條件下的施政治國一大成功經驗，也是古老中華文明、古老東方思維的一個合理繼承、延續和發展。

在當今地球上，生存著數以千計發展階段不同的大小民族，組成近200個制度各有差異的國家，伴隨人類文明進程大大加快，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兼容化已成為全球範圍的一大發展趨勢，成為認受程度越來越高的共同性追求目標，成為跨越國別、民族、宗教等界限的普遍社會現象。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令我們不能不更加清醒地去思考、反思我們民族的發展軌跡和當今走向，不能不盡量深層次地觀察、思索我們祖輩所建立的偉業和經驗，代價和教訓，以便更理性、更科學地把握機遇、開拓進取，用現代智慧、現代理念去構思我們新時代的發展路向，去選擇得失比例最佳的發展戰略，去作我們自身應該作也可能作的事，“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力求走出一條“節能型”社會發展之路，逐步推進民族偉大復興，以期達到富強、民主、文明的“大同型”社會理想境界。

二、兼容並蓄、求同存異——中國傳統思維的一個核心要素

“一國兩制”和整個鄧小平理論體系所以產生於當代中國，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現象，而是有其極其深遠的社會文化淵源和邏輯理論淵源，它不僅是馬列、毛澤東思想與理論的延續和發展，同時更是傳統中華文明世代相襲、傳承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港澳兩個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不僅是“一國兩制”和鄧小平理論體系的空前勝利，也是中華文明特別是體現求同存異、共同受益的傳統中國思維體系的空前勝利。

講起我們的民族，要充份肯定其成份的多元性，但更要認同其結構的統一性、完整性，以及命運、利益的一致性、共同性。正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所謂“多元”，是指中華民族不是單一的民族，而是由56個兄弟民族所組成的複合型民族共同體；所謂“一體”，是指結成一個完整有機的整體。為什麼這個“多元”能夠納為“一體”，而且這個“一體”不是短暫的，已經經歷了數千年，並且世代代還將繼續下去，歸根結底，就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在起著主要作用。¹ “中華民族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複合民族，作為這個大家庭的民族凝聚力，則是建立在民族整體與各個部份利益一致的基礎上，通過長期的交往、融合、同化，特別在反對共同的敵人和建設新生活的實踐和鬥爭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有一點值得特別指出，即中華民族的56個成員，“儘管生活方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上也有差異，但都希望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崇尚和學習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族的傳統文化，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各個成員，大體上有著反映於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有著基本一致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這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條件。”² 各少數民族不僅同漢族長期交流、融合、同化，而且有的少數民族如蒙古族和滿族還先後建立起長達162年和267年的元、清兩代中央政權。

中華民族是統一意識特別強烈的民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早在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中國“大統一”思想。統一歷來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要求，歷

1. 張磊、孔慶裕主編：《中華民族凝聚力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3頁。

2. 張磊、孔慶裕主編：《中華民族凝聚力學》，第3頁。

史上無論哪個民族建立中央政權，都極力設法平衡、安撫外夷，擴大統一，追求民族統一、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及其維護凝聚力的一大特質。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以倫比的經驗。”³ 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也說：“儘管中國疆土廣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萬別，但這次大陸始終維持一個政治統一體，而歐洲卻未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維繫整個中國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們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並且自古一直延續到今，可以說是更加源遠流長。”⁴

中華文化是個涵義廣泛、不約而同、博大精深的概念綜合體。它是開明開放、自尊自強、大度大器的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共同奮鬥、協力開拓的成果，是其大吞大吐、大吸大納、去粗取精、經年積累的結果。其一體多元特徵是極為明顯的。“所謂一體多元，是作為文化中國的總體特徵。它指的是：以中華民族的歷史、苦難、命運、奮鬥、理想為血脈，以母語思維與傳統文化為大體，既有承繼又有延伸創新，既母性又多重，是多民族、多地域、多樣態、多語種、多變化的具有中國人文智慧與文明之光的新文化”⁵。這個文化具有和而不同的特點，是承繼孔子強調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哲理，本體為一，為和、為元氣、為根基；萬形則為多，為不同，為各有所長，為互補互動。這個文化是我們民族大家庭的所有民族共同創造的，也是各個民族賴以維繫和睦團結、共同發展的動力源泉。自20世紀末港澳先後回歸以來，傳統的中華文化更包容屬局部地區性質、有明顯中外交匯特徵的港澳“一國兩制”文化。

中華文化以其無與倫比性、獨特性、大大豐富了世界文明的內涵，是全球性的主體文化之一。中華文化為西方的近代文明提供了物質基礎，而且有些方面還是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的直接源頭。“15世紀之前，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文明曾遙遙領先於當時的西方文明。從漢代到明代初期，中國的科學技術在世界上一直領先長達14個世紀以上。”⁶

3.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8頁。

4. 馮天瑜、楊華：《中國文化發展軌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頁。

5. 楊匡漢：《在一體多元中互動》，載《澳門歷史與發展》論文集，第15頁。

766 6. 江澤民：《提高全民族的科學素質》，見《院士科普書系》序。

不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以來，西方文明腳步大大加快，並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平衡，但人類文明的進步從來不是各自孤立的。正如李約瑟所說：“現代科學技術的誕生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準備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全歐洲曾經吸收了阿拉伯的學術知識，印度的思想意識和中國的工業技術。”⁷

中華文化綿延數千年，曾經對世界文明作出過重大貢獻，中華文化對於世界文明的最大貢獻，既包括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古代四大發明，同時也應包括中國古代樸素而實用的多元哲學體系以及寬厚、熱情熱烈的禮儀傳統。古代四大發明是中華文化的象徵，是中華民族奉獻給世界的最偉大的技術成果。它們在世界各國廣泛傳播，改變人類文明的結構，對世界歷史進程起到革命性推動作用。

不僅科技方面，就是倫理哲學、政治理想、文官考選制度、人文理念等深層次領域，中華文化也曾對西方文化的發展與成熟提供過諸多重要啟示。德國的萊布尼茨曾坦言：“我們在中華民族中發現了優美的道德，即在道德上，中華民族呈現著異樣的優越。”⁸看來，西方學者已開始調整對中華文明的認識定位，因為，“中華文明特有的凝聚力和包容性也許對西方強調個人權利與自由的自我中心主義是一副最好的解毒劑。”⁹顯而易見，中華民族不注重武力征服而崇尚精神感召的一貫風範，具有世界範圍的意義。

三、拓展資源、集中智慧——統一戰線理念的實踐與發揮

在中國，“統戰”和“政協”是社會政治生活中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匯，也是大家最感輕鬆、最易接觸的詞匯。統戰與政協作為一種先進的成功的理念和制度早已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7. 《東方和西方的對話》，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第6頁。

8. 馮天瑜、楊華：《中國文化發展軌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頁。

9. 方宇軍：《從中國到世界》，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頁。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含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後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的鬥爭中，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1997年9月12日，江澤民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指出：“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加強同民主黨派合作共事，鞏固我們同黨外人士的聯盟。繼續推進人民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範化、制度化，使之成為黨團結各界的重要渠道。鞏固和發展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裡有四層意思：一是體現執政黨與參政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要長期堅持並不斷完善；二是根據十六字方針，中共同民主黨派之間的合作、中共與黨外人士之間的聯盟具長期性、互為依存性、真誠性等特點；三是由人民政治協體現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三大任務的推進，要有規範化、制度化的保障；四是新時期統一戰線的組成和活動要以“愛國”為宗旨、為準繩。

統一戰線這種法寶地位和重要作用已被歷史和實踐反復證明，它不僅是奪取政權征途中被驗證是克敵制勝的一大法寶，而且在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在奪取和發展勝利成果過程中，同樣是不可或缺的一大王牌。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它的巨大威力已得到越來越多人士的認同。所謂統一戰線，係指“一些不同的階級階層、政黨、集團乃至民族、國家，為了實現一定的共同目標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組成的政治聯盟。簡要地說，統一戰線就是一定社會政治力量的聯合。”¹⁰ 正如鄧小平所深刻地指出：“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不是可以削弱，而是應該加強，不是可以縮小，而是應該擴大。它已經發展成為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最廣泛的聯盟。”¹¹ 所以，統戰

10. 引自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門網頁。

768 11. 轉引自《中國政協》，2002年第10期，第21頁。

是一種鬥智的學問，也是開放思維的表現，共贏共進理念的體現。它也構成我們民族智慧體系的一大要素和一大特點。

中國實行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也是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在中國，除了執政的共產黨之外，還有8個參政的民主黨派。這8個民主黨派，都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基本方針。中共處於執政黨的地位，領導著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非常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接受來自不同方面的監督。中共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的目的，就是為了互相監督。“對於共產黨來說，經常聽取其他黨派的意見，有利於及時發現和改正錯誤，有利於集中多數人的智慧，有利於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有利防止和克服腐敗。實踐證明，一黨領導、多黨合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中國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點，也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特點和優點。”¹²

由於20世紀90年代之後民主黨派被定位為參政黨，由於加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加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使然，同時由於政協具有不可取代的系列優勢，如人才薈萃，智力雄厚，能夠深入研究一些宏觀的、重大的、深層次的問題；代表性強，信息量大、能夠反映各方面群眾的意見、願望和要求；位置超脫，視界寬闊，能夠比較客觀地提出意見和建議；下通各界，上達中央，能夠發揮民主渠道作用等等，人民政協參政議政的廣度、深度勢將繼續拓展。

2000年11月李瑞環訪問香港特別行政區時指出：“我們這個5000年文明古國，之所以歷磨難而綿延不衰，屢處逆境而昂揚奮起，就是因為有許多這樣博大深邃的思想，有一種內在的強大凝聚力。當代中國要發展、要振興，必須繼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特別要倡導‘和合’，強調團結”。¹³

12. 李瑞環：《訪問土耳其時的一次講話》，新華社2001年5月2日電訊。

13. 李瑞環：《會面香港各界名人士時的講話》，《中國政協》，2000年第12期，第6頁。

由於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既是一件新事又是一件難事，既是實踐又是創新，因此，在堅持基本原則大前提下多講聯合、多講團結、力求不斷完善原有關係準則，力求營造一個大包容量、大聚合力的社會環境，把人、財、物這些體現人類文明物化成果的基因、元素凝聚在身邊，力求把寬鬆、寬厚、寬大的“和合”前景多方位、多層次、多向度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是需要認真關注的，因為唯“寬”字當頭方能形成公平競爭，方能化解矛盾糾紛，方能減小前進中的磨擦與阻力，從而方能有效地調整智力儲存與釋放，使民族偉大復興的人類壯舉更早地實現。

四、“一國兩制”——三代國家領導人政治智慧的結晶

1. 和平外交——新中國成功面最大的活動領域

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探索追求過程中，中國人民的奮鬥目標不外有兩項：一是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即結束挨打受欺的地位；二是強盛中興、共同富裕，即告別挨餓受窮的命運。這兩項目標又是互為條件、互為因果的：不推倒三座大山、不推倒舊的統治制度、不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國家的繁榮富強、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沒有前提、就無從談起；國家經濟實力、綜合國力不夠，人民大眾不能迅速走上富裕之路，也就談不上真正的獨立、真正的自主、真正的當家作主。

在東西方幾百年交往中，一個越來越得到普遍接受的成熟取向是：面對多元化多主體的不同理念、不同價值觀的爭辯對立，要設法尋求、認同、擴大共同點，也要設法擱置、淡化、化解不同點；要設法找到平衡點，也要防止衝突、矛盾的激化。推進這種求同存異的理性化行動，為人類當代思維提供深刻啟迪的大師正是周恩來。從1950年9月30日預示中國人民將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鏗鏘有力、義正詞嚴的聲明：“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決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入而置之不理”，到中蘇美英法五大國日內瓦會議，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推出到萬隆亞非會議求同存異講話的發表，從中日、中美之間民間外交的推動到尼克松訪華，中美簽署被譽為“周恩來外交風格”的各自表述形式的中美上海公報，周恩來的名字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直接連在一起。新

中國外交活動的成功，標誌著中華民族傳統智慧達到前所未有的成熟高度；周恩來外交理論的全面、深刻與其實踐的堅定、務實，是國際關係史和外交史上罕見的，正如錢其琛所說：“周恩來的外交實踐可說是新中國外交史的縮影。稱周恩來同志為新中國外交的創始人、奠基者，他是當之無愧的。”¹⁴

祇有堅持獨立自立的外交立場、外交傳統和外交風格，才能確保中國的聲音在國際事務上受到尊重，才能使中國的主權不受任何形式的損害。

早在建國初期，針對一些人對“一邊倒”的機械理解，周恩來即指出，“一邊倒”並非倒向某一國，而是倒向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和進步人類一邊，意味著在政治上必須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團結起來；“倒”並非倒在人家懷裏，也並非依賴人家，而是指在外交方面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態度和基本立場。他指出，“一邊倒”的實質就是國際統一戰線，明確反對什麼，聯合什麼。對兄弟國家戰爭上是要聯合，但戰術上不能沒有批評；對帝國主義國家戰略上是反對的，但戰術上有時在個別問題上是可以聯合的。不能理解為無條件地倒向蘇聯一邊，或是與美國的絕對對抗。¹⁵ 50年代中期，周恩來又指出，就社會制度來說，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個問題上是沒有中間路的。但是講到國際關係，就不能簡單地說，社會主義國家什麼都好，非社會主義國家什麼都不好，把兩個世界搞成鐵板兩塊，互不來往，互相攻擊，那就不是和平共處了，就會推動戰爭。這樣就是製造國際緊張局勢，不是緩和國際局勢了。這樣對我們是不利的。¹⁶

當時的周恩來就認為：東西方兩大體系、兩大陣營裡都有大國和小國，採取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是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別國不能干涉，干涉也不會有好結果，而應該在和平共處的國際環境中，由社會實踐來檢驗哪一種社會制度更為優越，給人民提供選擇的機會。正基於對這個問題的深思熟慮，周恩來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思想也就逐步趨於成熟，並發展成為指導國際事務的系統理論。

14.《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4、5頁。

15. 李宏：《理性與藝術外交大師——周恩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4頁。

16. 李宏：《理性與藝術外交大師——周恩來》，第273頁。

根據《亞洲事務》雜誌董事長兼東方戰略研究總裁法國人貝齊爾(Serge Berthier)的觀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以發生巨變，“其中的一個因素是，中國大陸具有很好的自我組織和安排的能力，在機制和體制的改革方面做得很好。這其中，有著對自己的獨特思想文化的繼承，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中國大陸正處在一個很有意思的階段，從經濟上、文化上消除了150年來的恥辱。這是一種再生、復興或者說崛起，這完全歸功於自己，關鍵是不再祇是模仿他人或者剽竊；自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是將古老的一套東西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從而出現了很好的政經發展趨勢。”¹⁷

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接見出席中印兩國政府談判印方代表團成員時，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說：新中國成立後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係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的原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根本出發點是：國家不分大小、強弱、富貧，不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和發展道路的異同，應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友好協商、互利合作、求同存異、和睦相處、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¹⁸ 這五項原則已成為當前解決國際關係的一項公認的基本準則，它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和尊重，它也必將繼續指導國際關係沿著正常的軌道發展。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公報的發表，是國際外交史上的嶄新一頁。尼克松的到訪被譽為“改變世界的一周”，“東西方兩大國‘20’多年來的第一次握手”，不僅顯示出新中國開始全面走向世界，而且也表現周恩來外交藝術取得又一成功。關於台灣問題，在公報中，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軍必須從台灣撤走。堅決反對任何製造‘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祇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

17. 貝齊爾：《怎樣正確認識中國及國際問題》，香港，《中國評論》2001年1月號，第84頁。

772 18. 李宏：《理性與藝術外交大師——周恩來》，第206頁。

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後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這種採取分別表明各自立場的別具一格的獨特做法，是周恩來外交藝術的一個創造，也是中外外交史上的創造。

“周恩來外交思想的基本方面，不僅為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形成了總體框架，而且也為80年代我國外交政策的調整提供了重要依據。”¹⁹從縱向來看，周恩來外交思想與舊中國的外交思想根本不同，他的外交思想是中國近、現代進步的國際政治及外交思想歷史的邏輯的發展，是站在時代前列的首創；從橫向來看，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同資產階級的外交思想有著本質區別，與前蘇聯的外交思想也有很大的差異，他的外交思想具有中華民族的傳統和中國特色。”²⁰

到鄧小平時代及其以後的20多年間，中國的和平外交、開放外交、雙贏外交又取得一次次新的突破，中華人民共和國越來越成為全球發展的一個動力來源，越來越被推到國際舞台的中央。

總之，主張互相尊重主權、平等互利、互通有無、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多體共贏的嶄新理念，既是推行新型外交事務的指導原則，又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出發點，這些原則既是古老中華文明、東方文明在新形勢下的升華與晶化，又是現代理性思維的集中體現。

2. 顯示政治智慧的重要決策

佔人類1/5的中華民族面前，新的奮鬥目標更加輝煌、更加偉大。本來要把一窮二白、千瘡百孔的國家建設好，世世代代在貧困、疾病、愚昧、落後邊緣掙扎的同胞逐步過上像樣的日子，讓站起來的中國人更快地富起來，這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遺憾的是，在戰爭破壞的經濟尚未恢復的情況下，國際上又有人把戰爭強加在中國人的頭上，為了應付一場關係家國興衰的戰爭，中國人民又耗盡了有限的資源和寶貴的數年時間。戰爭打贏了，但戰爭的後遺症卻拖了半個多世紀——台灣問題因美國的軍事干預

19. 李宏：《理性與藝術外交大師——周恩來》，第194、195頁。

20. 李宏：《理性與藝術外交大師——周恩來》，第337頁。

而複雜化。與其他相關問題一樣，解決台灣問題和香港澳門問題有其相似相近一面，具有很大的挑戰性，是考驗中國領導人智慧的一大難題。

同國際上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進和平外交相適應，20世紀50年代在堅持“一個中國”大原則、大前提之下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實現了兩個歷史性轉變；一是由“一定要解放台灣”、武力解放台灣向和平統一台灣的轉變，二是由實行同大陸一樣的制度向保留原有制度、原有體制、原有人事的高度自治模式轉變。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最高決策層，在堅持“一個中國”思想的基礎上，準備以武力統一中國的同時，也從未放棄政治解決台灣問題的努力；不僅通過一切可行途徑促進台灣問題的盡早解決，而且越來越清晰地勾劃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早期科學構想。

50年代中，作為國家最高決策人，毛澤東就和平解放台灣表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1956年4月，毛澤東又提出了和為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等原則。毛澤東還提出過要與台灣國民黨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說“我們同蔣介石也是這樣的微妙的關係。我們要同他恢復友好和合作的關係。我們過去合作過兩回，為什麼不能合作第三回呢？”²¹ 1958年10月，毛澤東說，“中國人的事祇能由我們中國人自己解決，一時解決不好，可從長商議，我們兩黨間的事情很好辦。”

在毛澤東構想基礎上，周恩來長期以來全面深化、全面推進這一系列構想的實踐，為後來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定型作了大量奠基工作。

1955年4月周恩來指出，如果美軍撤退，我們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的，如蔣介石接受，我們歡迎他派代表來北京談判。“祇要蔣介石同意中國的和平統一，同意和平解放台灣，並且派代表來京談判，我們相信即使蔣介石本人中國人民也可以寬恕他。但蔣介石必須承認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稱代表中國。”²² 5月13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個可能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周恩來的報告，標誌著中國政府根據當時歷史條件制定的新戰略方針的開

21. 《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274頁。

774 22. 《共和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頁。

始。同年7月30日，周恩來指出：“祇要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將會繼續增長，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願意和台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決台灣的具體步驟。”²³

60年代初，周恩來多次重申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不能成為美國佔領下的保護國，也不能搞兩個中國。在國共第三次合作問題上，他表現了堅定的原則性和靈活的策略性，並將毛澤東提出的許多重要原則，歸納、概括為有名的“一綱四目”。“‘一綱’即台灣回歸祖國。‘四目’是：(1)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的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2)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3)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的意見，協商決定進行；(4)雙方互約不派遣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原始構想。²⁴

“到這時，毛澤東和周恩來用‘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的想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²⁵“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有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張的，是‘一國兩制’理論的思想來源和理論準備。”²⁶這40年前形成的“一綱四目”，不僅成了20多年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基礎，而且至今仍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依據。不久，周恩來又托人轉告陳誠：“台灣歸還祖國以後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權利，除外交以外，軍隊、人事均可由台灣朋友自己來管。他說：過去送去的信件雖然是一些朋友個人寫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們個人在政府中擔任的工作可以變更，但對台政策是不會變的。”²⁷

“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從武力解放台灣的決策到最終形成以‘一綱四目’為核心的系統化、定型化的對台政策，體現出中共對台政策的深化，無疑對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確立“一國兩制”基本國策起到奠基作用。”²⁸如果就“一綱四目”政策與“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加以對比，那麼，兩者之間

23. 《人民日報》，1995年7月31日。

24. 李宏：《理性與藝術外交大師——周恩來》，第163頁。

25.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毛澤東到鄧小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49頁。

26. 錢淦榮：《鄧小平理論概論》，北京，中國財經出版社，1999年，第261頁。

27. 李宏：《理性與藝術外交大師——周恩來》，第163頁。

28. 婁傑：《中華文化與祖國統一》，武漢出版社，1999年，第149頁。

的內聯繫便一目了然：兩者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國家必須實現統一，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當局是控制省級行政區域的地方政府或特區政府，反對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兩者都是針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實施方案，強調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兩者都主張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家主體部份，其政府是中央政府，台灣當局是地方政府的前提下，台灣保留原有社會制度和軍隊，享有高度自治權，兩者都強調在聯合國和國際社會代表中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台灣當局已不具有代表中國的資格，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堅決反對任何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的陰謀，堅決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兩者都強調平等互信，維護民族大義，對後代、對歷史負責。因此，講“一綱四目”已經包含“一國兩制”基本國策的基本框架，是公正客觀的。

“國家統一觀是中國共產黨制定對台戰略的基礎，是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家統一大業的基本觀點的總和，直接決定對台政策的基本內涵和策略手段的運用。‘一國兩制’基本國策與‘一綱四目’政策體現的國家統一觀，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²⁹

在台灣與大陸即海峽兩岸走向和解、和平過程中，由於雙方力量對比的懸殊和基本理念的差異，擴大理性化思維、建立開放型思維，是至為重要的，而堅持下述基本點更形重要。

（1）台灣問題的存在是 20 世紀 40 年代後期中國內戰的後遺症。但台灣和大陸是中國版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

（2）1949 年後代表中國行使國家主權行為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台灣政權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性政權，無法律和事實根據繼續代表中國人民說話。

（3）台灣問題最後解決採用和平方式還是非和平方式是中國內政，是中國人民不容剝奪的權利。要力爭以和平方式最後實現兩岸的統一，但不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

（4）解決台灣問題以不損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前提，對台灣同胞的現狀和處境會給予最大限度的照顧。

776 29. 婁傑：《中華文化與祖國統一》，第 154 頁。

(5) 領土完整性、主權統一性體現全人民最大利益，不容許任何外來干涉，不容許一個中國分割成兩個主權主體。

(6) 統一之後大陸和台灣實行的社會制度不同，雙方井水不犯河水。這就叫“一國兩制”，根據鄧小平、江澤民、錢其琛等多次代表大陸一方所作的承諾，台灣可以保留軍隊，保持原來的政府架構，這是比港澳更加寬鬆的實踐“一國兩制”的模式。

(7) 大陸推進兩岸和平統一的底線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其標準演繹是：“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祇有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才能實現和平統一。”³⁰

關於台灣未來實踐“一國兩制”的模式，肯定比香港、澳門還要寬鬆，正如錢其琛於2001年9月10日在《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論壇上的講話所指出：“‘一國兩制’是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解決台灣問題，可以實行比港澳更寬的政策。比如：台灣可以繼續使用台幣；繼續保留軍隊；繼續作為單獨關稅區；繼續保持政府架構；大陸不會收取台灣一分一厘的稅收；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保持不變；台灣企業家保有原有財產；台灣人事自主，大陸不派官員去台灣任職，如此等等。”³¹ 上述政策中最突出的兩點是(1)“繼續保留軍隊”，而不需像香港、澳門那樣由中央派駐軍隊；(2)“繼續保持政府架構”，而不需像香港、澳門那樣要重新在當地推選行政長官並經中央任命，也不需重新組建有本地特點的行政、立法、司法架構。

主要由於國際因素的干擾，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目標至今尚未實現，但海峽兩岸的關係早已發生了今非昔比的深刻變化。改革開放後20多年間台灣居民前往大陸探親、旅遊、交流、作生意已成不可阻擋的發展大勢，為兩岸雙方、特別是為處境日趨艱難的台灣經濟帶來極大的支撐作用，也為兩岸最終走向和平統一奠定了基礎。最後解決台灣問題離不開“一國兩制”原則的靈活實行，離不開兩岸人民理性的推動，特別是離不開大陸與台灣雙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四方面因素對比關係的此消

30. 錢其琛：《在首都各界紀念江澤民關於解決台灣問題八項主張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8年1月27日第1頁。

31.《澳門日報》2001年8月11日A4版。

彼長、此長彼消的作用結果。政治手段是最後的結果，軍事手段是必要的準備，更為務實、更為有效的是經濟、文化兩方面的合作、交流，祇要大陸“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不受干擾，祇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第三步目標能夠依期推動，那應假以時日，當大陸有更強的經濟實力、有更高的發展成果、有更多元化的消費需求，即大陸磁場有更大吸引力令台灣無可擺脫時，兩岸和平統一也就真正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收穫季節了。

3. 港澳有幸成為實踐“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

香港、澳門這兩個珠江口上的城市，所以一直拖到20世紀末才得以回歸，說明不僅改革開放後鄧小平系統提出“一國兩制”是他政治智慧的集中體現，而且早期毛澤東、周恩來在我大軍壓境、兵臨城下情勢下，有意擱下來由“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轉為實行“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方針，也是政治智慧的高度表現。後一個政治智慧是前一政治智慧的淵源，前一政治智慧是後一政治智慧的創造性發展。

當我們國家整體上實現了小康，當我們2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為全國普通百姓帶來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好處，當北美、西歐、亞太這世上三大發達板塊都在為內銷疲軟、失業高企、增長乏力而苦惱時，“山那邊有好地方”——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大陸，依然充滿活力、後勁十足，當人們深深地懷念指引中國航船及時轉向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時，人們不會忘記這引發中國巨變過程的一個重要因素——外資的及時進入，而2001年總額已達3935億美元的到位“外資”中，港資佔了一半以上。香港、澳門在20世紀50—70年代中國被禁運封鎖時發揮了不可取代的特殊利用價值，80年代後中國開始同世界接軌的大潮中港澳兩地所發揮的特殊作用更是不可取代。不妨說，如果沒有當年毛澤東、周恩來的遠見卓識，那麼包括改革開放後的這段歷史也許會有另一種寫法。

20世紀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對港澳的意向是一時不急於解決。當毛澤東、周恩來決定在香港、澳門問題上保持現狀，主要基於兩個考慮：一是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於朝鮮戰爭後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的條件下，香港和澳門保持原狀對打破封鎖有利；二是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香港和澳門可以成為新中國引進外資、技術和人才的特殊渠道。

1951年周恩來對新華社香港分社作指示指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同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份，暫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來作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以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³²基於防止美國插手香港問題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在1957年正式提出了保持香港和澳門現狀，為我所用的政策。

劉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講到：“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搞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有這麼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³³1957年周恩來指出：“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與內地的不是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不好。因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³⁴

毛澤東在1959年又提出，“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我有用處”。在以後與外國客人的談話中，毛澤東又多次說，現在我們暫時不談香港問題。到1960年，周恩來又對港澳問題提出“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總方針。³⁵

針對國際上有人借港澳問題提出非難，中共中央於1963年3月8日首次公開聲明：“香港、澳門這類問題，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問題”；對於這類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中國人民並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堅定性。”

32.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第350、351頁。

33. 楊親華、科傑：《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決策》，載《毛澤東思想論壇》，1997年第3期。

34.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第351頁。

35. 1956年12月7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孫志明：《從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年，第180、181頁。

1972年3月8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主席，指出：“香港、澳門是被英國、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份，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所謂‘殖民化’範疇。因此，不應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區的名單之內。”同年11月8日，第27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批准非殖民地化委員會報告，確認中國對香港、澳門的立場和要求。

到1973年毛澤東又說，“我們現在對香港也不急。我們甚至不會去碰澳門。如果我們真的想去碰澳門，最多也祇會碰一點點。因為它是葡萄牙從明朝就開始緊緊掌控的地方。”³⁶毛澤東1974年對英國人說，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年輕一代人的事情了。³⁷

1974年，周恩來在病中重申對香港採取特殊政策，並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後，可以在一定時期實行資本主義。這不僅明確了收回香港的時間表和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而且還提出了保留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設想，成為“一國兩制”方針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³⁸長期以來，香港、澳門扮演了極為特殊的角色，成為實行“長期打算，充份利用”方針的目標。廖承志曾形象地把港澳描繪成大陸的“兩個鼻孔”。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李後在澳門回歸後回憶說：“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對外、對內都講了我們黨對香港的政策，香港暫時還是不收回為好，我們不急，對我們還有用處。總理講的比較更多一點，他就是說，香港是一個氣象台，是個觀察站，是個交際處。”³⁹

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工作重點開始轉移到現代化經濟建設上來，國內形勢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在改革開放新形勢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以審時度勢、高瞻歷史、尊重現實、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全面加速推進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

36.《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澤東周恩來密談曝光》，台灣《中國時報》，1999年1月10日。

37.《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02、606頁。

38. 楊親華、科傑：《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決策》，載《毛澤東思想論壇》1997年第3期。

3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中國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第213、214頁。

1979年元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告台灣同胞書》中提出，“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的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同日，鄧小平出席全國政協舉行的座談會上說：“今天是個不平凡的日子，今天有三個特點，第一，今天是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第二，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第三，把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日程上來了。”⁴⁰稍後他又明確表示：“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祇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制度。”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後，鄧小平全面加快對台灣回歸祖國問題的解決。他反復地講：我們是尊重台灣現實的，台灣的社會制度可以不動，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台灣人民的收入不會減少，祇會增加。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我們當然希望並力求以和平方式解決，但我們不能承擔這麼一個義務：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來實現統一祖國的願望。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來。“總的要求就是一條——一個中國，不是兩個中國，愛國一家。”⁴¹

1981年8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台灣、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樞時進一步指出：台灣不搞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不變，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國資本不動，甚至可以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我們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台灣的現狀也可以不變，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一個區，還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兩岸實現“三通”沒有先決條件；歸根到底，中國的統一要由台灣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和人民來決定，首先希望兩岸的領導人為中華民族的歷史來做這件事，這在歷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希望台灣的一些領導人把眼界放寬一點，放長遠一點。⁴²

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宣佈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在這份被稱為“葉九條”的文獻中談到：“國家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

40. 引自劉強倫、汪太理：《鄧小平卓越智慧》，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第234頁。

41. 《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6、107、109頁。

42. 《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200頁。

權、合法繼承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這不僅是“一綱四目”方針在新形勢下的具體化，而且也把後來定型的“一國兩制”方針輪廓全部鉤劃了出來。

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一位海外朋友說：“九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⁴³至此，“一國兩制”思維第一次以規範化的語言表述出來。1982年10月，鄧小平說，我們不用我們的制度和思想統一台灣，台灣也不可拿它的制度和思想來統一大陸，祇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可以談得上合作，相互容納，台灣保持台灣的制度，大陸保持大陸的制度，這樣就不發生你吃我，我吃你的問題。如果我們要用我們的制度和思想統一台灣不現實，不可能，那就祇有用武力，我們現在不採取這個方法，目的是讓我們民族統一起來，著眼於民族利益。⁴⁴

1983年6月，鄧小平進一步指出：“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祇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⁴⁵

中共誠意投桃，台灣有心報李。據悉，蔣經國秘密派國民黨退役陸軍少將沈誠先後三次前來北京商談祖國統一問題，受到鄧小平、楊尚昆、葉劍英、鄧穎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87年3月29日，沈誠帶著國家主席楊尚昆致蔣經國的一封親筆信回到台北，面呈蔣經國。4月4日蔣經國對沈誠說：“我覺得中共是有誠意的，黨對黨中央層次的談判是可行的”，“現已到了該下決心的時候了”⁴⁶遺憾的是，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突然逝世，使兩岸重新靠攏的努力被擱置，統一大業遇到了新的困難。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全面闡述了中國政府準備用“一國兩制”辦法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一是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

43. 劉強倫、汪太理：《鄧小平卓越智慧》，第235頁。

44. 劉強倫、汪太理：《鄧小平卓越智慧》，第235頁。

45.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頁。

782 46. 《國防》雜誌，2000年第3頁。

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⁴⁷ 再一個問題，是1997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大部份法律都可以保留，當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⁴⁸ 第三個問題是，中英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鄧小平這份《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的重要談話，表明用“一國兩制”構想最後解決香港以及澳門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

1984年2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再次明確地表示：“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⁴⁹ 這樣，“一國兩制”構想便成為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的理論依據，正式進入其實踐化的歷史階段。

通過“一國兩制”解決港、澳、台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大業問題，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大特色，是堅持開放思維的一大創舉。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⁵⁰ 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那就是：“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⁵¹

在最後解決台灣問題尚需付出耐心的情勢下，鄧小平當機立斷、不失時機地把“一國兩制”構想成功地用在香港、澳門兩大歷史遺留問題的解

4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9頁。

4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頁。

4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頁。

5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8頁。

5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8頁。

決。香港問題的解決自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開始，至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正式舉行為止，前後用了約18年時間。香港正式回歸祖國，標誌著我國人民洗雪了百年國恥，標誌著中國人民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從1986年6月30日中葡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首輪談判，到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澳門政權交接儀式在澳門正式舉行為止，前後共用13年半時間。這是關於“一國兩制”構想的第二次偉大實踐並取得圓滿成功，這是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國第三代領導人，繼成功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推進國家和平統一大業的又一歷史性勝利，其巨大意義不下於香港回歸。澳門回歸標誌著殖民制度在中國和整個東方的徹底結束，標誌著中國人自主全面行使國家主權的偉大時代業已正式開啟。

五、“一國兩制”——多領域理論創新的集中體現

1. 敢於堅持開放思維

“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是在改革開放之初，個人迷信、“兩個凡是”影響尚未完全消除，新的發展路線尚待完善，新的認識體系尚待形成之際，因此，它首先是堅持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的積極成果，是改革開放成功的一個重要標誌。

鄧小平把開放當作一個需長期堅持的戰略問題，“我們將長期實行對外開放，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世界一切國家建立、發展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關係”，“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應在下個世紀的前50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如果開放政策在下世紀前50年不變，那麼到了後50年，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更不會變了。”⁵²

“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個

784 5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70、103頁。

五年計劃時期是對外開放的，不過那時祇能是對蘇聯東歐開放。以後關起門來，成就也有一些。總的來說沒有多大發展。當然還有許多內外因素，包括我們的錯誤。歷史經驗教訓說明：不開放不行。”“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貧窮和落後，就必須開放。開放不僅是發展國際間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國際的經驗。”⁵³

不開放，人類文明的成果就吸不進來；不開放，就不能互通有無，不能把別人的知識、經驗“洋為中用”：不開放必然會導致封建意識、個人專斷、一言堂作風的泛濫；不開放，沒有發展的參照物，就不能顯示出所選定制度的先進性。所以，開放不僅意味着要把長期封閉的國門打開，而且也意味着要把蘊藏巨大潛能的民族智慧之門打開。

2. 姓資姓社靠實踐檢驗，兩制可以共生互補

鄧小平認為對於資本主義的東西，亦要有個科學的能度，着重強調了社會主義“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他指出：“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⁵⁴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國兩制”的主體，是“一國兩制”的大前提。“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⁵⁵在講到“一國兩制”中的兩種制度的關係時，鄧小平一再指出：“‘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裏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否則怎麼能說是‘兩制’呢？就變成‘一制’了。”⁵⁶

5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90、266頁。

5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9頁。

5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3頁。

5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9頁。

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更直接地提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⁵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國兩制”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鄧小平指出：“我們搞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⁵⁸

現代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是人類整體文明的組成部份，它難以被政治因素或民族因素所分割、所壟斷。因此，不利用資本主義所達到的科學技術上和文化上的成就，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實現向中級階段、高級階段的提升。這就是說，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要趕上和超過在科學技術和經濟上佔優勢的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合理利用資本主義世界已積累起來的資金、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等。今日的台港澳已基本達到或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發展水平，且直接構成國際市場的組成部份，充份利用三地資源就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事半功倍的有效途徑。

3. 中央集權制與聯邦制的科學組合

鄧小平1984年對“一國兩制”作出解釋：“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⁵⁹ 這兩種制度係指兩種主要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但也同時包含對國家制度的全新創造性構建，隨著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下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高度自治，在原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制度中便開始含有聯邦制的某些特點，即涉及中央與地方關係或者整體與局部的關係，

5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

5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7、218頁。

786 5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8頁。

已不再是單一的中央集權制。“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在整體與局部關係上，既不是聯邦制，也不是中央集權制，而是結合了兩種形式的特點，有聯邦制特點，也有中央集權制特點，是一種中國式智慧產生的新的國家形式。”⁶⁰ 一旦台灣問題最終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成立一個政策更加寬鬆的特別行政區，那麼這種新型的國家形式將更具中國特色，更能體現前所未有的理論創新精神。

在單一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允許設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別行政區，是“一國兩制”方針的一項重要原則和內容。據此設立的香港與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既具有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等一級行政區域相同的法律地位，也具有與其自身地位相適應的特殊的實行高度自治的法律地位。香港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們可以實行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享有和行使其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無法比擬的高度自治權。這是對單一制國家地方傳統權力範圍的一種突破，使中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帶有複合制的某些特徵。

4. 和平共處思維的拓展

鄧小平總結國內外形勢和社會實踐的新特點，明確地指出：“現在進一步考慮，和平共處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統一問題，也是一種和平共處。”⁶¹ 這無疑是對傳統和平共處理論的最新發展。

基於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的歷史和現狀，互相之間不宜採取以大吃小或以小吞大的解決辦法，不宜訴諸武力，強行解決，因為這樣做對各方都不利。用“一國兩制”的構想來解決台灣、香港、澳門問題，可以避免在亞太地區乃至整個國際社會引起政治動盪，有利於世界和平和動員各方面力量投入振興中華的現代化大業；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同屬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感情、民族利益和民族精神，以及共同的民族文化傳

60.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第358頁。

61.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4頁。

統和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質，決定了可以採取和平方法，以“一國兩制”構想解決國家統一和民族繁榮問題，因而“一國兩制”便為仍處分裂狀態的國家實現和平統一提供了一個嶄新的途徑和嶄新的模式。

擴大地講，這種新型和平共處思維對解決國際間任何因經濟利益或因宗教、種族、民族等文化差異而存在、積累、甚至惡化中的糾紛、對立、矛盾、抗爭，也是一積極而有價值的啟示，它將推動、促進人類求同存異、寬鬆容忍、智慧理性的行為準則的普遍建立。“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⁶² 可見，“一國兩制”思想的本質是和平，是以爭論雙方、矛盾雙方的互利雙贏為最高宗旨和最終歸宿，雙方都是勝利者，都沒有吃虧和失敗可言。

5. 對統一戰線理論的發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整個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統一戰線也出現了新形勢、新格局。“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使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在性質、對象和任務等方面形成了許多新的特點，使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增添了許多內容，從而發展了傳統的統一戰線理論。

“一國兩制”的構想，使新時期統一戰線在性質上大大不同於過去。愛國、民族統一，成為統一戰線的旗幟。祇要尊重自己所屬的中華民族，擁護祖國統一，都是愛國者，都是愛國統一戰線隊伍中的成員。鄧小平在闡述新時期統一戰線性質時說：“凡是炎黃子孫，不管穿甚麼衣服，不管其立場是甚麼，起碼都對中華民族有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這種自豪感的。”“未來香港政府的主要成份是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祇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⁶³ “一國兩制”充份反映和體現這種民族要求，從而使大陸人民和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旗幟下集合起來、團結

6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9、60頁。

788 6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0、61頁。

起來，因而新時期統一戰線的愛國主義性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了，其內涵更加充實了。

隨著“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實踐，愛國統一戰線的外延大大擴充了，既包括大陸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主義勞動者、愛國者，也包括香港、澳門、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所有擁護祖國和平統一的愛國者，可以說，包容了一切有愛國心的炎黃子孫。這樣，“一國兩制”就為如何擴大和加強愛國統一戰線，提供了新的可行方式，是實現祖國統一、民族大團結的最好模式和最佳選擇，同時也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奠定了更加有利的基礎。

6. 現代憲法學理論的一大突破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一個深思熟慮的科學構想，不僅對於實現中國和平統一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是對政治學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同時也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新經驗、新方法，具有現實的國際意義。它屬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嶄新內容和理論突破，是現代政治學探索與研究的一項具有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的重大成果，也是現代憲法學和現代政治學研究的全新課題和重要組成部份。

如果以美國憲法的制定為標誌，現代憲法發展的226年過程中，不管屬於那一個法系憲法，它所規範和保障的社會制度都是單一的。但1982年中國憲法由於寫進了體現“一國兩制”原則的第31條：“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一方面標誌著“一國兩制”已進入法制化階段，有了國家根本大法的保障，另一方面則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的包容量擴充了，成為全球唯一包容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憲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教訓，並根據中國具體國情，解決了在落後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許多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包括“一國兩制”在內的關於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理論和方針政策，並取得了相當成效。大陸在公有制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內搞活，對外開放，並實行以大陸的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香港、澳門和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為補充的經濟領域。“一國兩制”這一嶄新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

成部份，是對原有社會主義理論框架的重大突破，是社會主義憲政建設的新創造。“一國兩制”構想的豐富內涵，包括“一國兩制”與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發展戰略相適應的關係問題，關於必須在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體現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問題，關於“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兩制”任何一方都不能改變對方，井水河水互不相犯的問題，關於高度自治與保留中央的一定權力的關係問題，關於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問題，關於必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推行適合於港澳情況的民主政制以保持港澳長期穩定的問題，等等。這就使得“一個兩制”的構想進一步系統化和理論化，並構成了鄧小平理論，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重組成部份。